

## 范祖禹《唐鑑》的編纂特點及其史論探析： 以《唐鑑·高祖》為探討核心<sup>\*</sup>

朱 振 宏<sup>\*\*</sup>

### 摘 要

《唐鑑》是范祖禹史學的代表著作。編纂方面，《唐鑑》紀年若是一年中有兩個年號，咸取前者，且記事時不求時間的精確，一般只記載事件發生的年月，甚至偶有錯誤。敘事方面，〈高祖〉卷中有不少涉及到太宗李世民的史事。取材方面，范祖禹編纂《唐鑑》目的是在以唐史為宋帝借鑑，故〈高祖〉卷中選取史事，皆是在「以古（唐）喻今（宋）」。史論方面，范祖禹深受義理學影響，評史論事，以儒學的價值核心為依歸。《唐鑑·高祖》篇幅不長，仔細分析可發現范祖禹編纂上的許多特點，從其選擇武德年間的史事，更可以看出祖禹的思想及其以唐鑑宋的深層涵意。

**關鍵詞：**范祖禹、《唐鑑》、宋代、史學

---

<sup>\*</sup>本篇論文原宣讀於 2010 年 9 月 14-15 日，太平洋文化基金會、陝西黃帝陵基金會 共同主辦，「黃帝與中華傳統文化之發展研討會」，承蒙王德毅教授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。此外，本文也得到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寶貴的修改意見，使拙文避免無謂的錯誤，在此一併致謝。

<sup>\*\*</sup>朱振宏，現為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。

投稿日期：100.07.27；接受刊登日期：101.02.14；最後修訂日期：101.04.17

## **The Compilation of Fan Zu-yu's *Tang Jian*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Historiography — Focusing on *Tang Jian Gaozu* —**

Chu, Chen-hung<sup>\*</sup>

### **Abstract**

*Tang Jian* is representative of Fan Zuyu's history writing. This paper aims to *Tang Jian Gaozu* explore *Tang Jian* feature on the compilation, content and Fan Zuyu history commentary.

**Key Words:** Fan Zu-yu, *Tang Jian*, Song Dynasty, Historiography

---

<sup>\*</sup> Chu Chen-hu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th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.  
Received July 27, 2011; accepted February 14, 2012; last revised April 17, 2012.

《唐鑑》是范祖禹最重要的史學代表著作，<sup>1</sup>以往學界研究《唐鑑》，多半偏向探討范祖禹的政治思想以及范祖禹對於唐代史事的評論。然而，對於《唐鑑》選取唐代史事的標準以及《唐鑑》的編纂特點則甚少分析。本文係「范祖禹及其《唐鑑》研究」系列課題之一，<sup>2</sup>主要探討兩個問題：一是，《唐鑑·高祖》在編纂上呈現哪些特點？二是，《唐鑑·高祖》卷關涉到哪些史事？這些內容與范祖禹的評論，又反映出什麼樣的歷史意義。

## 壹、《唐鑑》簡介

范祖禹，字淳甫（一作淳夫、淳父），一字夢得，北宋成都華陽人（今四川省成都市人），世稱「華陽先生」，生於仁宗慶曆元年（1041），卒於哲宗元符元年（1098），享年五十八。范祖禹撰寫《唐鑑》的起迄時間，史無明確載記，他在哲宗元祐元年（1086）二月廿八日所上〈進《唐鑑》表〉稱：

臣昔在先朝，承乏書局，典司載籍，實董有唐，嘗於紬次之餘，稽其成敗之迹，折以義理，輯成一書。……其《唐鑑》十二卷，繕寫成六冊，謹隨表上進以聞。

3

<sup>1</sup> 范祖禹除獨立完成修撰《唐鑑》外，也曾與他人合力編修《資治通鑑》、《神宗正史》、《神宗實錄》等史著。上述史著中，《神宗正史》、《神宗實錄》今已亡佚不存，《資治通鑑》的總主編是司馬光，范祖禹擔任協修角色，主要負責「唐紀」中的叢目與長編工作。是以，《唐鑑》可說是最能代表范祖禹的史學著作。

<sup>2</sup> 筆者已發表〈范祖禹《唐鑑》的編纂及其內容特點——以《唐鑒·太宗》為探討核心〉，《史學史研究》，2008年第4期（北京：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總第132期，2008.12），頁35-46。是文後收錄瞿林東、葛志毅主編，羅炳良、郝振楠副主總，《史學批評與史學文化研究》（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2009），頁121-144。

<sup>3</sup> 范祖禹（北宋），《范太史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），第1100冊，卷13，〈進《唐鑑》表〉，頁198。

又於〈《唐鑑》序〉云：

臣祖禹受詔與臣光修《資治通鑑》，臣祖禹分職唐史，得以考其興廢治亂之所由。……臣謹採唐得失之迹，善惡之效，上起高祖，下終昭宣，凡三百六篇，為十二卷，名曰《唐鑑》。<sup>4</sup>

范祖禹於神宗熙寧三年（1070）六月加入司馬光編纂《資治通鑑》書局，在協助司馬光撰修唐紀叢目與長編期間，已萌發撰寫《唐鑑》。神宗元豐八年（1085）六月，范祖禹上〈論喪服儉葬疏〉：「臣嘗採唐事，為《唐鑑》數百篇，欲獻之先帝（神宗），屬先帝不豫，未及上。」<sup>5</sup>〈進《唐鑑》表〉云：「嘗於紬次之餘，稽其成敗之迹，折以義理，輯成一書。思與庶人傳言，百工執藝，獻之先帝（神宗），庶補萬分。比臣赴職，不幸先帝洮頰被冕，遽迫登遐，追攀莫及，抱恨沒世。」<sup>6</sup>據《宋史·神宗紀》記載：「（元豐）八年春正月戊戌（初三），帝不豫。……（三月）戊戌（初五），上崩于福寧殿。」<sup>7</sup>由此推測，《唐鑑》的完成時間約在神宗元豐七年（1084）末以至元豐八年（1085）初。<sup>8</sup>

宋人極重唐史的編纂，太祖建隆年間，曾令史臣編纂百卷本的《唐會要》，真宗朝陳彭年曾撰《唐紀》四十卷，自仁宗以至神宗，在四十多年間，又修撰了各種體裁的官撰、私修唐史著作有九部之多，<sup>9</sup>實與北宋中期士大夫懷抱強烈的憂患意

<sup>4</sup> 范祖禹，《唐鑑》，〈《唐鑑》序〉。

<sup>5</sup> 范祖禹，《范太史集》，卷13，〈論喪服儉葬疏〉，頁195。

<sup>6</sup> 同註3。

<sup>7</sup> 脫脫（元），《宋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），卷16，〈神宗紀〉，頁313。

<sup>8</sup> 陳鏡光，〈范祖禹《唐鑑》之研究〉（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，未刊本碩士論文，2004），提出《唐鑑》成書時間，應當不晚於元豐八年三月（頁23）。筆者認為，從〈論喪服儉葬疏〉所言「屬先帝不豫，未及上」及《宋史·神宗紀》所載元豐八年正月「帝不豫」，推測元豐七年底或八年初，范祖禹應已完成《唐鑑》，只因神宗在元豐八年三月崩逝，使范祖禹始終未能將《唐鑑》進呈給神宗。

<sup>9</sup> 仁宗至神宗年間所修撰九部官修、私撰唐史著作包括：胡旦，《唐乘》、王沿，《唐志》、石介，《唐鑑》、孫甫，《唐史記》（《唐史論斷》）、梅堯臣，《唐載》、歐陽修與宋祁，《新唐書》、呂夏卿，《唐書直筆》、吳縝，《新唐書糾謬》、范祖禹，《唐鑑》。

識，力求政治革新，而唐距宋近，治亂興衰之迹清晰，可資鑑之處最多，欲「以唐為鑑」、「以唐為鏡」，從唐史中尋找出治國之良方，達到安邦濟世的經世目的有關。<sup>10</sup>范祖禹撰修《唐鑑》亦出於此一目的，〈《唐鑑》序〉明白指出：「其（指唐朝）治未嘗不由君子，其亂未嘗不由小人，皆布在方策，顯不可掩。然則今所宜鑑，莫近於《唐書》。」<sup>11</sup>。

《唐鑑》一書共計十二卷，分三百零六篇，<sup>12</sup>除序言外，全書分為正文與史論兩大部分，以帝王在位先後順序，論及唐代二十帝，二百九十年的歷史。現今《唐鑑》的版本有：南宋孝宗朝浙江刻本；<sup>13</sup>呂祖謙音註《東萊先生音註唐鑑》宋刻元修本；<sup>14</sup>明孝宗弘治十年（1497）呂祖謙音註、徐朝文手校《明刊唐鑑》；<sup>15</sup>日本後西天皇寬文九年（1669）呂祖謙音註《和刻本東萊先生音註唐鑑》、<sup>16</sup>文淵閣四庫全書《唐鑑》；<sup>17</sup>清穆宗同治十年（1871）呂祖謙音註、胡鳳丹考異《唐鑑》<sup>18</sup>等。上述版本中，以南宋孝宗浙江刻本時間最早，也是現今僅存十二卷本的《唐鑑》，該

<sup>10</sup> 王盛恩、黃秋嘯，〈北宋中期的唐史研究述略〉，《平原大學學報》，第23卷第1期（河南：河南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6.2），頁71-72；宋馥香，〈論北宋的唐史編纂和政治訴求〉，《史學理論研究》，2006年第3期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，2006.9），頁81-90；高葉青、賈二強，〈《唐鑑》成因及其史學地位探析〉，《唐都學刊》，第23卷第4期（西安：西安師範專科學校，2007.7），頁93-94。

<sup>11</sup> 同註4。

<sup>12</sup> 文暢平的統計，《唐鑑》全書正文共332條，五萬餘字；評論294條，亦五萬餘字。參看氏著，〈《唐鑑》與范祖禹的史學思想述論〉，《大同高專學報》，第11卷第4期（山西：山西大同大學學報[社會科學版]雜誌編輯部，1997.12），頁41。筆者統計《唐鑑》全書共計310事，包括高祖19事、太宗55事、高宗11事、中宗（含武則天）20事、睿宗2事、玄宗41事、肅宗15事、代宗11事、德宗55事、順宗2事、憲宗30事、穆宗3事、敬宗2事、文宗6事、武宗5事、宣宗7事、懿宗2事、僖宗10事、昭宗10事、昭宣帝4事，范祖禹史評共290條。

<sup>13</sup> 范祖禹，《唐鑑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）。

<sup>14</sup> 范祖禹撰，呂祖謙音註，《東萊先生音註唐鑑》，《中華再造善本叢書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3）。

<sup>15</sup> 范祖禹撰，呂祖謙音註，《明刊唐鑑》，《景印岫廬現藏罕傳善本叢刊》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37）。

<sup>16</sup> 現存和刻本的《唐鑑》有若干版本，其中最早的版本為寬文九年范祖禹撰，呂祖謙音註，唐本屋清兵衛、小松太郎兵衛刻本的《東萊先生音註唐鑑》，詳參大塚宏昌，〈和刻本「唐鑑」について〉，《漢籍：整理と研究》，第6號（東京：漢籍研究會，1996.12），頁1-34。

<sup>17</sup> 范祖禹撰，呂祖謙音註，《唐鑑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），第685冊。

<sup>18</sup> 范祖禹撰，呂祖謙音註，胡鳳丹考異，《唐鑑》，《百部叢書集成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8），第95部。

本另附有范祖禹自序一篇，無注釋；其餘呂祖謙注本的《唐鑑》皆為二十四卷，內容與浙江刻本多有出入。又宋刻元修本與浙江刻本分卷不同，文字亦有出入。<sup>19</sup>比較各版本內容與文字差異，南宋孝宗浙江刻本雖無音註，但因刊刻時間最早，整體內容也最具完整性，是最重要的版本。<sup>20</sup>本文引用、分析〈高祖〉卷內容皆據浙江刻本。

## 貳、《唐鑑·高祖》的編纂特點

《唐鑑·高祖》卷起自隋煬帝大業十三年（617），止於武德九年（626），共計十年，記十九事。其中，武德元年（618）及武德九年各記四事；大業十三年與武德七年（624）各記三事；武德二年（619）、三年（620）、四年（621）、五年（622）、八年（625）各記一事；武德六年（623）無記事。從〈高祖〉卷所記十九事，我們可以歸納出范祖禹在編纂上有以下幾個特點：

第一，在紀年上，范祖禹編纂《唐鑑》的方法，明顯與司馬光纂修《資治通鑑》不同。《唐鑑》在編纂上，採用編年史體例，范祖禹曾參與協助司馬光編修《通鑑》長達十五年，不僅是司馬光修纂《通鑑》時間最長的助手，同時亦直接參與唐史與五代史修纂部份，幫助司馬光完成唐代三百年的「叢目」及六百卷的「長編」工作。理論上，祖禹纂修《唐鑑》，其紀年方式應與《通鑑》相同，然而，《唐鑑》紀年方式不同於《通鑑》，自有其特色。

<sup>19</sup> 孫瑜，〈《唐鑑》及其史學價值〉，《山西大同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第21卷第2期（山西：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，2007.10），頁37。

<sup>20</sup> 陳鏡光，〈范祖禹《唐鑑》之研究〉，曾對上述各版本文字內容與特色進行對照比較，得出浙江刻本整體內容完整性，實為各版本《唐鑑》中最高；宋刻元修本是現存最早二十四卷本《唐鑑》，也是最接近呂祖謙分卷作註的本子；《明刊唐鑑》在各版本中錯誤最多的本子；日本《和刻本東萊先生音註唐鑑》經常發生字型相類漢字的混淆錯誤；四庫全書《唐鑑》雖文字錯誤甚少，但卻有對原書內容篡改的嚴重問題（特別是范祖禹有關蠻夷外族的批評字句）；胡鳳丹考異《唐鑑》最為晚出，然其所據為《明刊唐鑑》，也存在一些問題（頁23-31）。

其一，司馬光編修《資治通鑑》在紀年上，大凡一年之中有兩個年號以上者，皆以最後者為定。司馬光在〈答范夢得〉有云：

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。假如武德元年，則從正月便為唐高祖武德元年，更不稱隋義寧二年。玄宗先天元年（712）正月，便不稱景雲三年，梁開平元年（907）正月，便不稱唐天祐四年也。<sup>21</sup>

反觀，《唐鑑》的紀年方式，凡一年之內有兩個年號以上者，皆以前者為是。如《唐鑑·高祖》開篇的紀年書寫方式是：

隋大業十三年，高祖為太原留守，領晉陽宮監。……五月，以詐殺副留守王威、高君雅，遂起兵，遣劉文靜使突厥，約連和。

案：「大業」為隋煬帝年號。據溫大雅，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記載：

煬帝後十三年，勅帝（筆者案：指唐高祖李淵）為太原留守，……（十一月）壬戌（十五日），乃率百僚，備羽儀法物，具法駕，迎代王即位於〔大興殿，時代王〕十餘歲矣。大赦天下，改大業十二〔當為十三〕年為義寧元年。<sup>22</sup>

是以，大業十三年當年有兩個年號，十一月壬戌以前稱大業，以後稱義寧，《通鑑》取「義寧」，而《唐鑑》取「大業」。《唐鑑·高祖》的開篇紀年方式並非特例，而

<sup>21</sup> 司馬光（北宋），《傳家集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88），卷 63，〈答范夢得〉，頁 613。

<sup>22</sup> 溫大雅（唐），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），卷 1，頁 2、卷 2，頁 38。又，《通鑑》繫改元時間與《起居注》同；然兩《唐書·高祖紀》皆記改元義寧的時間是在大業十三年十一月癸亥（十六日）。

朱振宏／范祖禹《唐鑑》的編纂特點及其史論探析：以《唐鑑·高祖》為探討核心

是全書通則。<sup>23</sup>

何以范祖禹不取司馬光「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」的紀年方式？宋人洪邁，《容齋隨筆》已指出《通鑑》紀年有其窒礙不通之處：

司馬公修《資治通鑑》，……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。……然究其所窮，頗有窒而不通之處。……隋煬帝大業十三年，便以為恭皇帝上，直下卷之末恭帝立，始改義寧，後一卷則為唐高祖。蓋凡涉歷三卷，而煬帝固存，方書其在江都時事。……凡此之類，殊費分說。<sup>24</sup>

張須，《通鑑學》亦指陳：

《通鑑》之失，最可舉者亦不越三端：一曰，繫年方式之過整：溫公繫年之法，有一不變之方式，曰：「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。」……此種方式，可使一年之內，斷歸某主，而年號不至歧出；然究其所窮，頗有窒而不通之處。……處一年兩帝之年，而但標一帝之年號，必至使讀者迷眩而生誤會。……此其淆於心目，而害於事實，非細事也。《通鑑》本紀年之書，今拘於方式而遠於實際，復何以為紀年之準則？故余於溫公此種書法，深為不取。<sup>25</sup>

《唐鑑》凡年號一年有兩出之處，以前者為定，推測范祖禹此法即是針對《通鑑》紀年窒礙不通之處所進行的變革，使讀者不致迷眩混淆而生誤會。

其二，《唐鑑》在陳述史事時，紀時方面不甚明確，〈高祖〉卷在敘史上一般只

<sup>23</sup> 如西元 710 年亦有兩個年號，七月己巳（二十日）唐睿宗登基帝位改元前稱「景龍」；大赦改元後稱「景雲」。《唐鑑》卷四的紀年稱「景龍四年」，《通鑑》稱「景雲元年」。

<sup>24</sup> 洪邁（南宋）撰，孔凡禮點校，《容齋隨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），〈容齋續筆〉，卷 4，〈資治通鑑〉，頁 262-263。

<sup>25</sup> 張須，《通鑑學》（臺北：臺灣開明書店，1982），頁 211-212。



記載事件發生的年份，至多書明月份，並不精求正確的時間，茲舉兩例以明之。例一：

高祖使建成、世民將兵擊西河郡，攻拔之，執郡丞高德儒。……遂斬之。自餘不戮一人，秋毫無犯。<sup>26</sup>

例二：

（武德）四年十月，趙郡王孝恭、李靖圍江陵。蕭銑降。帝數之。……竟斬於市。<sup>27</sup>

《唐鑑》未寫明精確時間，此或與祖禹撰寫《唐鑑》之主要目的是在「稽其（筆者案：指唐朝）成敗之迹，折以義理」、<sup>28</sup>「採唐得失之迹，善惡之效」，<sup>29</sup>把唐代歷史作為闡述評論的背景資料，藉由攝取唐史中的某些重要片段，抒發其義理；至於保存史料、梳理歷史發展脈絡則不是祖禹著述本書的旨趣，<sup>30</sup>也因此紀時上的精確與否，並非其最重要考量。

第二，《唐鑑·高祖》紀時上偶有錯誤。例如：

（武德元年）五月詔曰：「近世以來，時運遷革，前代親族，莫不誅夷，興亡之

<sup>26</sup> 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），卷184，〈隋紀八〉，將高祖使建成、世民將兵擊西河郡事繫於恭帝義寧元年六月甲申日（初五）；攻拔之繫於己丑日（十日），頁5738。

<sup>27</sup> 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卷189，〈唐紀五〉，將此事繫於武德四年十月乙巳（二十一日），頁5936。

<sup>28</sup> 同註3。

<sup>29</sup> 同註4。

<sup>30</sup> 宋馥香，〈論《唐鑑》的編纂特點及其歷史評論特色〉，指出《唐鑑》不以保存史料、梳理歷史發展脈絡和反映歷史發展趨勢為著述旨趣，而是把歷史作為產生評論的背景資料，其史料則是對《通鑑》內容予以節錄或改寫，在記史的格式上保留了編年體的體例形態（頁74）；文暢平，〈《唐鑑》與范祖禹的史學思想述論〉，也提出《唐鑑》的寫作重點不在提供史實，重點是放在政治方面，通過對唐代皇帝的政治活動，圍繞唐帝的得失來反映唐朝的成敗興衰（頁41）。

效，豈伊人力。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，并付所司，量才選用。」。

《新唐書·高祖紀》亦有載此詔，時間與內容與《唐鑑》有別：

（武德元年）六月乙酉（十二日），奉隋帝為酈國公，詔曰：「近世時運遷革，前代親族，莫不夷絕。歷數有歸，實惟天命；興亡之效，豈伊人力。前隋蔡王智積等子孫，皆選用之。」<sup>31</sup>

《通鑑》亦將此詔繫於武德元年六月乙酉。<sup>32</sup>是以，《唐鑑》此條不僅刪削詔書內容，紀時上亦錯誤。<sup>33</sup>

第三，《唐鑑》敘史的體例上與司馬光有別。司馬光，《通鑑釋例·書帝王未即位例》有云：「帝王未即位皆名，自贊拜不名，以後不書名。」意即帝王未即位之前為臣，《通鑑》書臣皆稱名，朝廷舉行贊拜儀式不稱名，至其即位前，書其官名、封爵而不書其名。<sup>34</sup>是以，敘述唐高祖李淵代隋建唐以前的史事，凡提及李淵者，司馬光逕書其名（李）淵，<sup>35</sup>或在名前冠上唐公，<sup>36</sup>及至隋恭帝進封李淵為唐王，則稱其名或在名前冠以唐王，<sup>37</sup>迨武德元年五月甲子（二十日）李淵登基帝位，此後《通鑑》凡稱李淵，才曰「帝」，或曰「上」。《唐鑑》則不然，李淵尚未稱帝建

<sup>31</sup> 歐陽修、宋祁（北宋），《新唐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），卷1，〈高祖紀〉，頁7。

<sup>32</sup> 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卷185，〈唐紀一〉，高祖武德元年六月乙酉條，頁5795。

<sup>33</sup> 《唐鑑·高祖》卷紀時上出現錯誤並不是特例，〈太宗〉卷亦是如此，可參看拙文，〈范祖禹《唐鑑》的編纂及其內容特點——以《唐鑑·太宗》為探討核心〉，頁38-39。

<sup>34</sup> 鄔國義，〈《通鑑釋例》三十六例的新發現〉，《史林》，1995年第4期（上海：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，1995.12），頁7。

<sup>35</sup> 如《資治通鑑》，卷182，〈隋紀六〉，煬帝大業九年（613）八月條云：「帝（筆者案：指隋煬帝）以元弘嗣、斛斯政之親也，留守弘化郡，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，……淵御眾寬簡，人多附之。」（頁5682）。

<sup>36</sup> 如《資治通鑑》，卷183，〈隋紀七〉，煬帝大業十二年（616）十二月條云：「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，……。」（頁5712）。

<sup>37</sup> 如《資治通鑑》，卷185，〈唐紀一〉，高祖武德元年正月丁未條云：「春，正月，丁未朔（初一），隋恭帝詔唐王劍履上殿，贊拜不名。……唐王既克長安，以書諭諸郡縣，……。」（頁5771-5772）。

唐前，祖禹凡提李淵時，逕書廟號「高祖」，諸如「隋大業十三年，高祖為太原留守，領晉陽宮監」、「高祖使建成、世民將兵擊西河郡」、「高祖以書招李密」；李淵登基帝位建唐後，則以「帝」稱之，例如：「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，……帝省表大悅，下詔褒稱，……」、「（武德）四年十月，趙郡王孝恭、李靖圍江陵。蕭銑降，帝數之。」、「太子建成欲圖秦王世民，……帝遣宇文穎召（楊）文幹，穎以情告之文幹，遂舉兵反。」〈高祖〉卷中僅有一例不按此原則：

武德元年三月，隋恭帝詔以唐王為相國，加九錫。王謂僚屬曰：「此諂諛者所為耳！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，可乎？必若循魏晉之迹，彼皆繁文偽飾，欺天罔人。……」或曰：「歷代所行，亦何可廢？」王曰：「堯舜湯武，各因其時取與異道，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，未聞夏商之末，必效唐虞之禪也。……」但改丞相府為相國府，其九錫殊禮，皆歸之有司。

是時，李淵尚未建唐，按祖禹編纂原則，李淵當書為「高祖」，但此條卻稱「唐王」，與《通鑑》的書寫方式相同。推測《唐鑑》此條不按通則，恐是祖禹一時的手民之誤。通觀《唐鑑》全書，我們可以發現，范祖禹但凡在其他卷次提及某唐帝事，多以該皇帝的廟號書之。例如：

（武德九年）九月，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殿庭，……由是人思自勵，數年之間，悉為精銳。

武德九年八月甲子（初八），李世民登基。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於殿庭，按理當稱李世民為「帝」，然因《唐鑑》將此條繫於〈高祖〉卷，故此條稱李世民為「太宗」，以免誤解。而在《唐鑑·太宗》的兩卷中，凡稱李世民者，皆以「帝」稱之。

第四，《唐鑑》書唐太宗李世民事，不始〈太宗〉卷。由於司馬光和范祖禹皆

認為李唐的創業及統一全國，李世民都起了首功的作用，因此，在《唐鑑·高祖》卷中，也多次涉及到太宗事。從隋大業十三年，唐高祖李淵舉兵至武德九年八月李淵禪讓退位，〈高祖〉卷所記十九事中，有關唐太宗者即多達六件，此乃《唐鑑》唯一特例，其他卷次中所不見者（該卷次涉及其他唐帝事）。綜觀《唐鑑·高祖》范祖禹評論高祖的事件，其中絕大多數是批評李淵的作為，由此也可以考察范祖禹對於李淵的評價。

### 參、《唐鑑·高祖》的內容及史論

《唐鑑·高祖》卷共記十九事，內容包括李唐起兵、治亂因由、為君與為臣之道、唐代職官制度及田賦制度、對外族和親、太宗奪位等等。歸納〈高祖〉卷的取材內容及范祖禹史論上，有以下幾個特點：

第一，范祖禹的政治思想，反映在《唐鑑》上，具有顯著「儒學化」的現象。<sup>38</sup>祖禹以儒家的禮教思想為中心，凡君臣行事，必須恪守孔子的禮樂教化、名分綱常，符合孟子的「仁義」主張，若是違反此核心價值者，寧可「守死不為不義」。〈高祖〉卷中，祖禹所選評之事，多以是否合於仁義、倫理來論斷是非。例如：李唐創業過程中，李淵次子世民首謀舉兵，<sup>39</sup>懼李淵不從，於是與裴寂合謀，裴寂先是以晉陽宮人私侍李淵，再告之以起兵之事，李淵於是被迫舉兵，並遣劉文靜使東突厥，約連和。對此，范祖禹評論道：

---

<sup>38</sup> 孫立堯，〈“史者儒之一端”試解——兼論司馬光、范祖禹的史論〉，《南京大學學報（哲學·人文科學·社會科學）》，第40卷第2期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3.6），指出中國史學自從《春秋》成為儒家的一門學術以後，史學一直都是儒學的一個分支，而北宋史學的一個特點即是史學的進一步儒學化，其中最顯著的代表即是司馬光與范祖禹（頁137）。

<sup>39</sup> 有關李唐太原起兵首謀者，兩《唐書》與《資治通鑑》皆稱出自太宗李世民，范祖禹承其說。李樹桐，〈李唐太原起義考實〉，《唐史考辨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65），指出李唐太原起義，實為高祖李淵所主動，決非太宗李世民首謀，所謂的太宗首謀之說，實為唐代史官許敬宗所偽造（頁1-42）。

匹夫欲自立於鄉黨，猶不可不自重也，況欲圖王業，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啟之乎？太宗陷父於罪，而脅之以起兵，高祖昵裴寂之邪，受其宮女而不辭，又稱臣於突厥，倚以為助，何以示後世矣。……是以，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，戎狄多猾夏之亂，蓋高祖以此始也。……太宗恐高祖之不從，懼突厥之為患，……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歟！……惜乎，太宗有濟世之志，撥亂之才，而不知義也。

祖禹認為，李唐創業過程可非議者有三：李世民居迫其父舉兵、李淵昵裴寂之邪、李淵依恃突厥兵，此三者既不符合以義取天下，又開啟戎狄亂唐之先河，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范祖禹對於「義」的重視，遠超過對於「才略」的重視，而唐以「(李世民)脅父(李淵)臣虜(東突厥)」方式立國，違背了君臣名分倫理綱常，亦是大逆不道之舉。

又如李淵進長安立楊侑為帝(隋恭帝)，恭帝欲以李淵為相國，加九錫。李淵認為此乃諂諛者所為，一如魏晉禪代者，以繁文偽飾，欺天罔人，其功業不及五霸而欲求名過三王。但改丞相府為相國府，其九錫殊禮，皆歸之有司。范祖禹評論道：

魏晉之君，欺孤蔑寡，以奪天位，考其實無異於寒浞、王莽，……唯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為，故繁文偽飾，有所不行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。然以兵取而必為之文曰受禪於隋，是亦未免襲衰世之迹也。雖不能正其名，實如三代之王，而優於魏晉則遠矣。

祖禹認為，李淵乘隋末衰世而代隋建唐，雖不能正其名如三代之王，但其拒九錫殊禮，不循魏晉禪代故事，則其行事遠優於魏晉之君。

對於為君之道，范祖禹認為國家之治亂，政治之良窳，與國君擇才取士有著絕

朱振宏／范祖禹《唐鑑》的編纂特點及其史論探析：以《唐鑑·高祖》為探討核心

對密切的關聯性。是以，李淵即位之初，旋即量才選人、廣開言路之舉，祖禹給予高度的肯定：

唐高祖始即位而錄隋之子孫，由漢以來，最為忠厚。其享國長世，宜哉！

高祖鑑隋之所以亡，王業初基，庶事草創，而首辟言路，以通下情，可謂知所先務矣。是以海內聞風，如熱者之得濯，廢者之得起。……唐室之興，不亦宜乎！

祖禹認為，李唐建業不久即能開創盛世，享國又長，此均與國君慎選良才，下情上達有關。但對於李淵以女寵選任宇文士及、以諂巧不忠之佞臣封德彝為內史舍人，祖禹則大力批評：

高祖以女寵進（宇文）士及，責（封）德彝之諂巧。既斥之矣，復悅其計策而驟用之。甚矣！……人君一為所惑，不能自解，鮮有不至禍敗者也。

至於為臣之道，范祖禹從天理的角度認為，為人臣者應以孝友事其主，而非以巧智謀功。高祖在位期間，太子建成與秦王世民各樹黨友，太子中允王珪、太子洗馬魏徵說建成結納豪傑，擊劉黑闥之徒以建功名，祖禹深不以為然，評論道：

王（珪）、魏（徵）以輔導東宮為職，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，友於秦王，則儲位安矣。……建成既為太子，則國其國也，安在於有功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，結豪傑以自助，是導之以爭也，禍亂何從而息乎？

此外，為臣者亦當忠貞無貳，臨大節不可奪志。「玄武門事變」後，原太子建成之東宮臣屬魏徵、王珪轉侍太宗，范祖禹對兩人的行為予以否定：

今建成為太子，且兄也；秦王為藩王，又弟也。王（珪）、魏（徵）受命為東宮之臣，則建成其君也。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？……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，朝以為仇，暮以為君，於其不可事而事之，皆有罪焉。臣之事君，如婦之從夫也，其義不可以不明。苟不明於君臣之義，而委質於人，雖曰不利，臣不信也。

在對外關係上，范祖禹堅守夷夏之防，對於李淵聽從裴矩之議，與西突厥統葉護可汗和親以抗東突厥，祖禹批評道：

自漢以女嫁匈奴，而後世習為故常，結昏戎狄，不以為耻。……以女為間，而欲奪人之國，亦耻也。高祖不謀於眾賢，而問諸亡國之臣（筆者案：指裴矩），宜其不知耻也。且西突厥不若頡利（筆者案：東突厥國君）之強，弱者猶許其昏，則強者何以制之？此不足以示威，適足取侮於四夷而已。

祖禹反對與外族和親，此與其政治思想和北宋所處時代環境有密切關係。前面已論及祖禹的政治思想是以儒學綱常禮教為核心價值，在夷夏之辨上，《春秋》主張的「尊王攘夷」是祖禹看待宋與外族關係的標準。有宋一代正處於對外關係艱困時期，遼與西夏長期對宋產生巨大的壓力，因此強調夷夏之別，反對唐朝推行與外族的和親政策。

第二，范祖禹助司馬光協修《資治通鑑》，是以《唐鑑》所錄唐代史事，基本不出《通鑑》。然〈高祖〉卷中卻有一事不見於《通鑑》，很值得注意：

（武德）三年五月，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，謂善行曰：「為我語唐天子，吾為老君，吾而祖也。」詔於其地立廟。

吉善行見白衣老父一事，亦不見於兩《唐書》。李吉甫，《元和郡縣圖志·河東道一》記載：

（晉州）神山縣，……武德三年，見神於羊角山下，語曲沃人吉善行曰：「報大唐天子，得聖理一千年。」其年，勅遣通事舍人柳憲立祠，因改縣為神山。<sup>40</sup>

王欽若，《冊府元龜·帝王部·符瑞四》有云：

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二年（筆者案：當為武德三年），太上老君見於晉州羊角山，語樵人吉善行云：「為報唐天子，吾是爾遠祖，亳州曲仁里是吾降生之地，有枯檜重榮，唐祚永興。」高祖遂於羊角山置興唐觀，其地改為神仙縣，封羊角山為龍角。<sup>41</sup>

關於吉善行見白衣老父及李淵遣通事舍人柳憲於羊角山立廟（祠）一事，杜光庭，〈歷代崇道記〉有詳記：

至武德元年（筆者案：當為武德三年），晉州浮山縣羊角山著素衣，戴金冠，乘朱驥白馬，令吉善行告神堯（筆者案：指唐高祖李淵）……高祖大悅，詔授善行為朝散大夫，賜物一百段，乃令通事舍人柳憲於羊角山立廟，復改浮山縣為神仙縣，羊角山為龍角山。太上又現，為善行曰：「天子喜歡否？」對曰：「大喜。」又曰：「疑惑何事？」復對曰：「為不知聖者姓名耳！」太上曰：「我是無

<sup>40</sup> 李吉甫（唐）撰，賀次君點校，《元和郡縣圖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），卷12，〈河東道一·晉州〉，頁338。又可參看王溥（北宋），《唐會要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），卷70，〈州縣改置上·河東道·晉州〉，頁1490。

<sup>41</sup> 王欽若（北宋）等編纂，周勛初等校訂，《冊府元龜（校訂本）》（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06），卷25，〈帝王部·符瑞第四〉，頁252。



上神仙，姓李氏，號老君，即我也。我即帝之祖也。《史記》中有傳。亳州谷陽縣本廟有枯檜再生為驗。我已令周公旦領神兵，助國家打劉黑闥，得四月節即破矣。」孝義又令善行入奏，高祖乃勅善行馳驛往洛陽軍所宣勅，示諭至時，果平黑闥。四海大定，枯檜亦重生焉。乃改廟為慶唐觀，內有明皇御製書碑及列聖真容並在。<sup>42</sup>

李淵因吉善行之言，遂遣通事舍人柳憲於羊角山立廟（後改為慶唐觀），<sup>43</sup>並將羊角山改稱為龍角山。晉州神山縣羊角山因和開國傳說相關聯，故成為唐王朝聖地之一，與道教結下不解之緣。<sup>44</sup>李淵以讖語符瑞假托與道教始祖老子關係，並不始於武德三年，早在李淵創業起兵初期，已藉助道教力量，宣示天命所歸。溫大雅，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記載：

（大業十三年七月）壬戌（十四日），霖雨甚，頓營於賈胡堡，去霍邑五十餘里。……于時秋霖未止，道路泥深，帝乃命府佐沈叔安、崔善為等間遣羸兵往太原，更運一月糧，以待開霽。甲子（十六日），有白衣野老，自云霍太山遣來，請帝，請謁。……野老對曰：「某事山祠，山中聞語：『遣語大唐皇帝云：若往霍邑，宜東南傍山取路，八月初雨止，我當為帝破之，可為吾立祠廣也。』……。」帝曰：「……山神示吾此路，可謂指蹤。雨霽有徵，吾從神也。然此神不欺趙襄子，亦應無負於孤。」……八月己卯（初一），霖止。帝指霍太山而言曰：「此神之語，信而有徵。封內名山，禮許諸侯有事。」乃命所部鄉人設祠致祭焉。<sup>45</sup>

<sup>42</sup> 董誥（清）編，《全唐文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），卷 933，杜光庭，〈歷代崇道記〉，頁 4307 中。又可參看張沖虛，〈上枯檜再生表〉，《全唐文》，卷 928，頁 4289 中。

<sup>43</sup> 柳憲於羊角山置廟，此廟後改名稱，〈歷代崇道記〉稱之為「慶唐觀」；〈上枯檜再生表〉記為「興唐觀」。劉昫（後晉），《舊唐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），卷 37，〈五行志〉記載：「（大曆）九年（774）九月，晉州神山縣慶唐觀檜樹已枯重榮。」（頁 1372）；《新唐書》，卷 34，〈五行志一〉所記相同（頁 875）。是故，當以「慶唐觀」為是。

<sup>44</sup> 雷聞，《郊廟之外——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9），頁 112。

<sup>45</sup> 溫大雅，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，卷 2，頁 22-23、27。

引文中所謂白衣野老攜霍太山神之命，救李淵於危難之中，學者認為此與道教有關，李淵欲利用道教宣傳自己的正統性，<sup>46</sup>而唐初的崇道，係借讖說以示承天應運，其符瑞又多假道教始祖老子偽托顯現授命，遂依附為老子的後裔，藉以達到政治上的目的。<sup>47</sup>

對於李唐祖出老子之說，范祖禹認為此乃「卑天誣祖」的行為，實不可取：

唐之出於老子，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，高祖啟其原，高宗、明皇扇其風，又用方士詭誕之說，躋老子於上帝。卑天誣祖，悖道甚矣。與王莽稱王子儁為皇祖叔父何以異哉！

引文中「高祖啟其原」，即是指武德三年高祖於羊角山立廟之事；「高宗、明皇扇其風」係指唐高宗於乾封元年（666）二月，至亳州幸老君廟時，追號老子為「太上玄元皇帝」；<sup>48</sup>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（741）正月，於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，<sup>49</sup>以及天寶二年（743）三月，將西京玄元宮改名為太清宮，<sup>50</sup>並以此建立太清宮制度，列入國家禮典等。<sup>51</sup>范祖禹反對佛道迷信，更對這種方人術士假托宗教詭誕之說採以批判的態度，李淵祖述老子，實與王莽偽稱周靈王太子晉（王子晉）為己遠祖叔

<sup>46</sup> 宮川尚志，《六朝史研究（宗教篇）》（京都：平樂寺書店，1964），頁176-185。氣賀澤保規，〈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的性格特點〉，收入劉俊文主編，《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（六朝隋唐卷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），研究指出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包含的白旗、白衣天子、白衣野老等與「白」相關的記載，是深受道教影響，反映出李唐創業時期需要借助道教的力量及重視道教的立場（頁212-243）。有關李唐創業採用圖讖道教思想，又可參看李豐楙，《六朝隋唐仙道類小說研究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6），頁304-320。

<sup>47</sup> 丁煌，〈唐高祖太宗對符瑞的運用及其對道教的態度〉，《漢唐道教論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），頁54-72。

<sup>48</sup> 《舊唐書》，卷5，〈高宗紀下〉，頁90。

<sup>49</sup> 《舊唐書》，卷9，〈玄宗紀下〉，頁213。

<sup>50</sup> 《舊唐書》，卷9，〈玄宗紀下〉，頁216。

<sup>51</sup> 有關玄宗崇道以及太清宮制度建立，參看丁煌，〈唐代道教太清宮制度考〉，《漢唐道教論集》，頁73-156；雷聞，《郊廟之外——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》，頁110-112。

父無異，皆是悖道的行為，不足取法。我們若聯繫到范祖禹對於李淵賜姓給徐世勣的評價：

古者天子建國，賜姓命氏。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。……子孫各本於其祖，不可改也。漢高祖賜婁敬姓為劉，鄙陋無稽，而唐世人主遂以為法，非其親者附之屬籍，或加於盜賊、夷狄，以逆族異類為同宗。……夫唯天親不可以人為，而強欲同之，豈理者乎？上瀆其姓，下忘其祖，非先王之制，不可為後世法也。

祖禹不僅非議偽托遠祖的行為，對於人君賜姓亦持反對的態度，認為這些都是悖祖違天之舉，非先王聖人之制，實不足以取法。

為何〈高祖〉卷中范祖禹要特別記載李淵托祖立廟此一不見於《通鑑》與兩《唐書》之事件？學者指出此或是因為祖禹對於君權神授的天命史觀不感興趣，反對定命論的歷史觀，也反對神鬼怪異的迷信之說，抨擊祥瑞符命，<sup>52</sup>然恐不只如此。范祖禹編纂《唐鑑》目的是在以唐史做為宋帝戒鑑，〈《唐鑑》序〉明白指出：「其（筆者案：指唐朝）治未嘗不由君子，其亂未嘗不由小人，皆布在方策，顯不可掩。然則今所宜鑑，莫近于《唐書》。」<sup>53</sup>又云：

夫唐事如彼，祖宗之成效如此，然則今當何鑑不在唐乎？今當何法不在祖宗乎？夫唯取鑑於唐，取法於祖宗，則永世保民之道也。<sup>54</sup>

昭示出《唐鑑》係以唐代史事提供宋帝經國鑑戒之方策。范祖禹在〈高祖〉卷中，

---

<sup>52</sup> 陳勇、韋慶緣，〈《唐鑑》何以見重於宋室——兼論范祖禹的封建正統思想〉，《吉林師範學院學報》，1994年第4期（吉林：吉林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4.12），頁70；陳鏡光，〈范祖禹《唐鑑》之研究〉，頁62。

<sup>53</sup> 同註4。

<sup>54</sup> 范祖禹，《唐鑑》，卷12，〈昭宣帝〉。

朱振宏／范祖禹《唐鑑》的編纂特點及其史論探析：以《唐鑑·高祖》為探討核心

特載李淵開啟唐室崇道一事，此與宋帝崇信道教有關，宋朝自太祖趙匡胤以來，歷代提倡道教，太宗登基，因有「燭影斧聲」之疑，為平社會之私議，製造翊聖將軍降世顯靈故事。邵博，《邵氏聞見後錄》記載：

國初，有神降於鳳翔府盩厔縣民張守真家，自言：「天之尊神，號黑殺將軍。」守真遂為道士。……開寶九年（976），太祖召守真，見於茲福殿，疑其妄。十月十九日，命內侍王繼恩就建隆觀降神，神有「晉王有仁心」等語。明日太祖晏駕，晉王即位，是謂太宗。詔築上清太平宮於終南山下，封神為翊聖將軍。<sup>55</sup>

太宗即位之後好道，下令廣搜道書，並曾兩次接見華山道士陳搏，賜號為「希夷先生」。<sup>56</sup>端拱二年（989）十二月，群臣上太宗尊號為「法天崇道皇帝」。<sup>57</sup>真宗之崇道與其為掩飾「澶淵之盟」恥辱有關。司馬光，《涑水紀聞》記載：

蘇子容曰：王冀公（欽若）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（準）於真宗，真宗曰：「然則如何可以洗此恥？」冀公曰：「今國家欲以力服契丹，所未能也。戎狄之性，畏天而信鬼神，今不若盛為符瑞，引天命以自重，戎狄聞之，庶幾不敢輕中國。」上疑未決，因幸秘閣，見杜鎬，問之曰：「卿博通《墳典》，所謂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者，果有之乎？」鎬曰：「此蓋聖人神道設教耳。」上遂決冀公之策，作天書等事。故世言符瑞之事，始於冀公成於杜鎬云。<sup>58</sup>

蘇轍，《龍川別志》亦有云：

<sup>55</sup> 邵博（南宋）撰，劉德權、李劍雄點校，《邵氏聞見後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），卷1，頁2。

<sup>56</sup> 《宋史》，卷4，〈太宗紀一〉，頁72。

<sup>57</sup> 《宋史》，卷5，〈太宗紀二〉，頁84。

<sup>58</sup> 司馬光撰，鄧廣銘、張希清點校，《涑水記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），卷6，〈符瑞事始於王欽若成於杜鎬〉，頁120。

契丹既受盟而歸，寇公每有自矜之色，雖上，亦以自得也。王欽若深患之，一日，從容言於上曰：「此《春秋》城下之盟也，諸侯猶且恥之，而陛下以為功，臣竊不取。」真宗愀然不樂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……欽若曰：「惟有封禪泰山，可以鎮服海內，誇示夷狄。然自古封禪，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，然後可為也。」既而又曰：「天瑞安可必得，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，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，以明示天下，則與天瑞無異矣。」上久之乃可。……然上意猶未決，莫適與籌之者。它日，晚幸祕閣，惟杜鎬方直宿。上驟問之曰：「古所謂河出圖，洛出書，果如何事耶？」鎬老儒，不測上旨，謾應曰：「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。」其意適與上意會，上由此意決。……由是天書、封禪等事，（王）旦不復異議。<sup>59</sup>

真宗聽從王欽若之言，大行「神道設教」，改元「大中祥符」、<sup>60</sup>偽造天書符瑞、天神下臨等神跡，<sup>61</sup>咸藉托神道，表現出天命之所在。大中祥符五年（1012）十月，真宗對輔臣說夢，謂「神人傳玉皇之命，云：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，令再見汝，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。」又夢見靈仙儀衛天尊降臨，言：「吾，人皇九人中一人也，是趙之始祖，再降，乃軒轅皇帝，……主趙氏之族，今已百年。」於是布告天下，制夷天司命保生天尊號「聖祖上靈高道夷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」，聖祖母號「元天大聖后」。<sup>62</sup>保生天尊成為趙宋皇室之家族神。真宗為抬高道教玉帝的地位，又於大中祥符七年（1014）九月，尊上玉皇聖號為「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

<sup>59</sup> 蘇轍（北宋）撰，俞宗憲點校，《龍川別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），卷上，頁72。

<sup>60</sup> 中華書局編輯部，《宋大詔令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），卷2，〈帝統二・改元・改大中祥符元年赦〉記載：「朕欽承命祚，思惠黎元，撫御萬邦。……肅清醮於齋壇，天重寶籙，祇膺景貺，躬受丹書。所期純嘏以及人，豈止殊禧而在己。載窺秘檢，誕錫元符，清淨為宗，濬發愛民之旨，延洪儲祉。……可大赦天下，改景德五年為大中祥符元年。……。」（頁6）。

<sup>61</sup>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，接連幾次出現天書符瑞、天神降臨等神跡，詳參《宋史》，卷104，〈禮志七〉，頁2539-2540。

<sup>62</sup> 《宋史》，卷104，〈禮志七〉，頁2541-2542。

帝」；<sup>63</sup>大中祥符九年（1016）正月，再上保生天尊聖號為「聖祖天尊大帝」。<sup>64</sup>真宗尊太上老君，大中祥符六年（1013）八月，加封號為「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」。<sup>65</sup>此外，真宗在全國各地大修道教宮觀，京師汴京城內興建玉清昭應宮，費時七年，「宮始成，凡二千六百一十楹」，<sup>66</sup>造玉皇像、聖祖像、真宗御像，舉凡修祠祀、飾宮觀，「屋室有少不中程，雖金碧已具，必毀而更造，有司不敢計所費」，<sup>67</sup>耗費大量金錢。史稱真宗一朝「封禪事作，祥瑞沓臻，天書屢降，導迎奠安，一國君臣，如病狂然。」<sup>68</sup>真宗亟欲藉由天書、崇道以闡明天命，強化其至高無上的皇帝形象。<sup>69</sup>有鑑於北宋歷朝崇尚道教，托尊保生天尊大帝為趙宋遠祖，引發出種種弊端與社會問題，范祖禹於是在〈高祖〉卷中，藉由李淵崇道，偽托祖出老子之事，希望由此告誡宋帝，所謂天書符瑞等事，實乃妖人方士詭誕之說，而假托始祖，更是誣祖悖道行為，實不足以效法。

第三、《唐鑑》所載唐代史事，與《通鑑》一樣，多以政治事件為主，甚少記載制度方面的內容。然而，在〈高祖〉卷中，兩度論及唐代的制度：一是，有關唐代三公、職事官、文武散官、勳官等官制；二是，唐代田賦均田租庸調法。關於官制的評價，范祖禹認為唐代官制紊亂不明，因未師法古代《周官》制度：

三公論道經邦，變理陰陽，故不以一職名官。……自漢以來失之矣，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，是以官名之紊，莫甚于唐。……夫天地之有四時，百官之有六職，天下萬事備盡於此，如網之在綱，裘之挈領，雖百世不可易也。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，苟舍《周官》，臣未見其可也。

<sup>63</sup>《宋史》，卷8，〈真宗紀三〉，頁157。

<sup>64</sup>《宋史》，卷104，〈禮志七〉，頁2542。

<sup>65</sup>《宋史》，卷8，〈真宗紀三〉，頁154。

<sup>66</sup>《宋史》，卷63，〈五行志二上〉，頁1377。

<sup>67</sup>《宋史》，卷466，〈劉承規傳〉，頁13609。

<sup>68</sup>《宋史》，卷8，〈真宗紀三〉，172。

<sup>69</sup> 劉靜貞，〈權威的象徵——宋真宗大中祥符時代（1008—1016）探析〉，宋史座談會編，《宋史研究集》（臺北：國立編譯館，1995），第二十三輯，頁43-70。

對於唐代實行均田制度和租庸調稅制，范祖禹亦加以批判，認為社會之所以貧富不均，主因在於唐初定均田，有給田之制，其後租庸調法壞而為兩稅法，為政者未有不有能制民之產，扶貧抑富所致：

自井田廢，而貧富不均，……不知富者所以能兼併，由貧者不能自立也。貧者不能自立，由上之賦斂重，而力役繁也。……後之為治者，三代之制雖未能復，唯省其力役，薄其賦斂，務本抑末，尚儉去奢，占田有限，困窮有養，使貧者足以自立，而富者不得兼之。此均天下之本也。不然，雖有法令，徒文具而已，何益于治哉！

范祖禹在〈高祖〉卷中，特舉唐代官制與田賦制度，其目的是在藉由批評唐制，反對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改革。祖禹透過推美《周官》與三代之制，實際上是表達「祖宗之法不可廢」的政治立場，主張一切制度法令之良窳好壞，並不在於制度法令本身，而是人主用人得當與否。對此，南宋朱熹有深刻的評論，《朱子語類》記載道：

《唐鑑》議論弱，又有不相應處，前面說一項事，末又說別處去。……《唐鑑》議論，覺似迂緩不切。考其意，蓋王介甫秉政造新法，神考專意信之，以為真可以振起國勢，一新其舊，故范氏之論每以為此惟在人主身心之間而不在法。……《唐鑑》也有緩而不精確處，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，說得都無收殺。只云在於得人，不在乎法，有這般苟且處。審如是，則古之聖賢徒善云爾。他也是見熙寧間詳於制度，故有激而言。要之，只那有激，便不平正。<sup>70</sup>

---

<sup>70</sup> 朱熹（南宋），《朱子語類》，《朱子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），第拾捌冊，卷 134，〈歷代一〉，頁 4176-4178。

又云：

唐租、庸、調，大抵改新法度，是世界一齊更新之初方做得。如漢衰魏代，只是漢舊物事。晉代魏，亦只用這個。以至六朝相代，亦是遞相祖述，弊法卒亦變更不得。直到得元魏、北齊、後周居中原時，中原生靈死於兵寇幾盡，所以宇文泰、蘇綽出來，便做得租、庸、調，故隋、唐因之。《唐六典》載唐官制甚詳。古禮自秦、漢已失，北周宇文泰及蘇綽有意復古，官制頗詳盡。如租、庸、調、府兵之類，皆是蘇綽之制，唐遂因之。<sup>71</sup>

由上引朱熹所論，則唐租庸調稅法乃漢魏以來更新之法度，唐代官制，亦有復古之意，並不如祖禹所評之不堪。從朱熹評論《唐鑑》，可以看出，祖禹議論，有時不免感情用事，或有「迂緩不切」或「說得都無收殺」之處，蓋因王安石秉政造新法，神宗專意信之，使其對現時政治不滿，激發反抗之心，故而有此激言，這種情緒，藉由《唐鑑》表現出來。<sup>72</sup>是故，范祖禹在〈高祖〉卷中，特別標舉唐代兩項制度，目的是在「以古喻今」，藉唐制以論變法改革之不當。

第四，在〈高祖〉卷裡，范祖禹多次評論立儲問題：

其一、武德五年，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傾秦王世民，雙方引樹黨友。東宮臣屬王珪、魏徵建議太子建成親討劉黑闥、結納山東豪傑，建功立威，以安儲位。對此，范祖禹評論道：

立子以長，不以有功；以德，不以有眾，古之道也。……王（珪）、魏（徵）以輔導東宮為職，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，友於秦王，則儲位安矣。……且建成既

<sup>71</sup> 朱熹，《朱子語類》，卷 136，〈歷代三〉，頁 4229-4230。

<sup>72</sup> 王德毅，〈范祖禹的史學與政論〉，《宋史研究論集（修訂版）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3），頁 25。



為太子，則國其國也，安在於有功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，結豪傑以自助，是導之以爭也。禍亂何從而息乎！

其二、武德七年，太子建成欲圖秦王世民，擅募驍勇以為東宮衛士，號為「長林兵」。又密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長安，即將爾朱煥等人致送兵器予楊文幹。其後，爾朱煥等人告發太子唆使楊文幹舉兵，最終導致楊文幹反叛，史稱「楊文幹事件」。關於此事，范祖禹評論道：

建成為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，又使楊文幹反於外，以危君父，此天下之惡也。罪孰大焉！高祖不以公義廢之，……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，此高祖不明之過也。

其三、武德九年六月，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、齊王元吉，史稱「玄武門之變」。事變後，高祖立世民為皇太子，並於同年八月傳位於太子。對於「玄武門之變」，范祖禹評論道：

建成雖無功，太子也；太宗雖有功，藩王也。……立子以長不以功，所以重先君之世也。故周公不有天下，弟雖齊聖，不先於兄久矣。

〈高祖〉卷共記載十九事，范祖禹論及儲君之事竟達三次，此固然是因為唐高祖在位期間，太子建成與秦王世民之間矛盾衝突不斷，「儲位之爭」始終是武德年間最重要，也最棘手的政治問題，祖禹分別在「建成討劉黑闥」、「楊文幹事件」與「玄武門之變」等三事件中，評論他的看法。然而，筆者認為，祖禹多次討論儲位問題，實另有深意。

北宋創建以來，擇立儲君，傳位制度始終未定。史載，建隆二年（961），昭憲

杜太后臨終時，曾命太祖趙匡胤死後傳位其弟趙匡義，太祖允諾，由趙普記錄遺命，藏之金匱，史稱「金匱之盟」。<sup>73</sup>開寶九年（976）十月，太祖暴崩，趙匡義即位，對於太祖暴死的原因，民間流言不斷，以致有「燭影斧聲」之說，因此關於太祖生前是否真有「金匱之盟」以及太宗得位的正當性，產生了懷疑。<sup>74</sup>太宗一朝儲君之選立也是幾經曲折，先是太宗長子元佐因病被廢為庶人，次子元僖又於淳化三年（992）突然中毒暴死，太子之位一度懸虛，直到淳化五年（994）八月，在寇準等人的勸說下，太宗才立襄王元侃（恒）為太子。至道三年（997）三月，太宗駕崩，李皇后與宦官王繼恩等人，曾企圖擁立元佐為帝，幸賴呂端等人處置得當，趙恒才能順利即帝位。<sup>75</sup>仁宗在位四十二年，有三子，然皆相繼夭折，儲君之位一直是未決，仁宗晚年多病，范鎮、韓琦、司馬光等朝臣多次上奏，要求及早建儲以安天下，直到嘉祐七年（1062）八月，仁宗才立宗室濮安懿王之子宗實（曙）為皇太子，半年後仁宗即病逝。英宗在位僅四年，身體不佳，幾次「不豫」，但也始終未立儲君，直至治平三年（1066）十二月，英宗病危之中，輔臣韓琦力勸，才立長子仲鍼（頊）為太子，半個月後，英宗逝世。神宗在位十九年，也是到了病危之際，在輔臣王珪請求下，才立第六子傭（煦）為太子，蔡確、章惇、邢恕等人曾在神宗彌留之際，還合謀擁立神宗弟雍王趙顥或曹王趙頴，終未果。<sup>76</sup>

范祖禹一生歷經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，有鑑於北宋儲位制度不備，太子之選定，每每是在皇帝病危之時，其間或有不肖權臣從中謀畫不臣之事，使皇位的繼承，不能平穩順利。因此，祖禹在修纂《唐鑑·高祖》時，再三提及唐高祖期間，太子建成與秦王世民爭奪皇位之事，一方面指出儲位建立的重要性，同時也對於擇立儲君的原則和條件，提出自己的看法，希望藉此提供宋帝立儲時的參考。

<sup>73</sup> 《宋史》，卷 242，〈太祖母昭憲杜太后傳〉，頁 8607。

<sup>74</sup> 鄧廣銘，〈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問題辨析〉，《宋史十講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），頁 23-54。

<sup>75</sup> 《宋史》，卷 281，〈呂端傳〉，頁 9516。

<sup>76</sup> 《宋史》，卷 471，〈蔡確傳〉，頁 13700；同卷，〈邢恕傳〉，頁 13703。

第五，黃宗羲在《宋元學案》一書中，將范祖禹歸入「涑水門人」，<sup>77</sup>可見祖禹在學術思想上承襲司馬光，《唐鑑》中的史論與司馬光《通鑑》唐紀部分的史論相輔相成，史論觀點大抵一致，司馬光於《通鑑》中已有議論者，祖禹多不再舉論。<sup>78</sup>關於「玄武門之變」，〈高祖〉卷與司馬光《通鑑》皆有史論，頗為特殊。司馬光對於此事的看法是：

立嫡以長，禮之正也。然高祖所以有天下，皆太宗之功；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，地嫌勢逼，必不相容。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，隱太子有泰伯之賢，太宗有子臧之節，則亂何自而生矣！既不能然，太宗始欲俟其先發，然後應之，如此，則事非獲已，猶為愈也。既而為群下所迫，遂至喋血禁門，推刃同氣，貽譏千古，惜哉！夫創業垂統之君，子孫之所儀刑也，彼中、明、肅、代之傳繼，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！<sup>79</sup>

范祖禹的史論則是：

建成雖無功，太子也；太宗雖有功，藩王也。太子君之貳，父之統也，而殺之是無君父也。立子以長不以功，所以重先君之世也。故周公不有天下，弟雖齊聖，不先於兄久矣。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、元吉，比周公誅管蔡。臣竊以為不然。……管蔡流言於國，將危周公，以間王室，得罪於天下，故誅之。非周公誅之，天下之所當誅也，周公豈得而私之哉！……若夫建成、元吉，亦得罪於天下者乎？苟非得罪於天下，則殺之者，己之私也，豈周公之心乎！……古之

<sup>77</sup> 黃宗羲（清）原著，全祖望（清）補修，陳金生、梁運華點校，《宋元學案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），卷8，〈涑水學案下·涑水門人〉記載：「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別為《元城學案》、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別為《華陽學案》、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別為《景迂學案》、節孝歐陽先生中立」（頁355）。

<sup>78</sup> 孫立堯，〈“史者儒之一端”試解——兼論司馬光、范祖禹的史論〉，頁141-142。

<sup>79</sup> 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〈唐紀七〉，高祖武德九年八月條，頁6012-6013。

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，義重於死故也。必若為子不孝，為弟不弟，悖天理，滅人倫，而有天下，不若亡之愈也。……然則，太宗之罪著矣。

比較兩者之間的相同點，司馬光與范祖禹皆肯定太宗對於唐朝創業之功，然而從禮制名分的觀點來看，兩人都認為儲君當以立長而不立功，太宗此舉實乃違反禮義名分。然而，司馬光雖重禮分，批判太宗「蹠血禁門，推刃同氣」行徑，但也不完全拘泥於禮制，從人事角度強調事變之發生乃當時形勢所迫的結果，一方面隱太子建成「以庸劣居其右，地嫌勢逼，必不相容」，另一方面太宗「為群下所迫」，不得不發，最終造成了這場悲劇。反觀，范祖禹評論此事，嚴格遵守義理倫常標準，認為建成太子地位不因無功而受到影響，太宗以藩王身分竟殺害「君之貳，父之統」的太子，以下犯上，「是無君父也」；而以弟殺兄，又是「為弟不弟」、「悖天理，滅人倫」的行為，太宗以一己之私，誅殺無罪的隱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，雖終有天下，「不若亡之愈也」，實則「太宗之罪著矣」。祖禹深受當時程頤理學的影響，將國家的治亂興衰一切歸結於倫理道德，故其史論多以禮法立論，評史論事，褒貶人物。

80

## 肆、結論

綜合以上所述，本文結論可歸納簡述如下：從編纂特點來看，《唐鑑·高祖》卷雖採用編年史體例，但在紀事書法上是以《春秋》的價值作為評判歷史的標準，紀年上若是一年當中有兩個年號，則取前者，且記事時不求時間的精確，一般只記

---

<sup>80</sup> 陶懋炳，《司馬光史論探微》（長沙：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107-108；汪高鑫，〈司馬光范祖禹唐史觀點不一致論〉，《安徽史學》，2000年第1期（合肥：安徽省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，2000.3），頁16-18；陳勇、韋慶緣，〈《唐鑑》何以見重於宋室——兼論范祖禹的封建正統思想〉，頁69-71。

載事件發生的年月，甚至偶有錯誤。此外，敘事體例上，大凡李淵稱帝前的史事，祖禹以「高祖」稱之；李淵稱帝後的史事，祖禹則以「帝」稱之。由於范祖禹認為有唐創業過程，李世民居首功，是故〈高祖〉卷中有不少史事，涉及到李世民。

就內容及史論分析，范祖禹深受程頤義理理學的影響，其政治思想更傾向於儒家義理，評史論事，一切均以儒學的價值核心為依歸，強調禮樂綱常、名分正道的重要性，認為國家的治亂興衰，掌握在國君自身的修養以及善於擇人，廣開言路。在對外關係上，祖禹嚴守夷夏之防與華夷之別，反對與外族和親。值得注意者，范祖禹編纂《唐鑑》目的是在以唐史為宋帝借鑑，故〈高祖〉卷中，祖禹所選取許多史事，皆是在「以古喻今」，諸如以唐朝官制、均田制、租庸調制，表達反對變法的立場；藉由李淵偽托李唐出自老子及崇道立廟之事，反映北宋歷代提倡道教所產生的社會弊端；透過評論唐高祖武德年間的儲位之事，希冀能為宋帝擇立儲位，提供參考。

《唐鑑·高祖》卷篇幅不長，仔細分析仍可發現范祖禹編纂上的許多特點，從其選擇武德年間的史事，更可以看出祖禹的思想及其以唐鑑宋的深層涵意。

## 參考書目

### A. 古籍(依筆劃順序)

中華書局編輯部，《宋大詔令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。

王欽若（北宋）等編纂，周勛初等校訂，《冊府元龜（校訂本）》，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06。

王溥（北宋），《唐會要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。

司馬光（北宋），《傳家集》，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88。

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。

司馬光撰，鄧廣銘、張希清點校，《涑水記聞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。

朱熹（南宋），《朱子語類》，《朱子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。

李吉甫（唐）撰，賀次君點校，《元和郡縣圖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。

邵博（南宋）撰，劉德權、李劍雄點校，《邵氏聞見後錄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。

洪邁（南宋）撰，孔凡禮點校，《容齋隨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。

范祖禹（北宋），《范太史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第 1100 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。

范祖禹（北宋），《唐鑑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。

范祖禹（北宋）撰，呂祖謙音註，《明刊唐鑑》，《景印岫廬現藏罕傳善本叢刊》，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37。

范祖禹（北宋）撰，呂祖謙音註，《東萊先生音註唐鑑》，《中華再造善本叢書》，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3。

范祖禹（北宋）撰，呂祖謙音註，胡鳳丹考異，《唐鑑》，《百部叢書集成》，第 95 部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8。

脫脫（元），《宋史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。

黃宗羲（清）原著，全祖望（清）補修，陳金生、梁運華點校，《宋元學案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。

溫大雅（唐），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。

董誥（清）編，《全唐文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。

劉昫（後晉），《舊唐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。

歐陽修、宋祁（北宋），《新唐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。

蘇轍（北宋）撰，俞宗憲點校，《龍川別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。

## B. 專書

### （一）中文

李豐楙，《六朝隋唐仙道類小說研究》，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6。

張須，《通鑑學》，臺北：臺灣開明書店，1982。

陶懋炳，《司馬光史論探微》，長沙：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9。

雷聞，《郊廟之外——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》，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9。

### （二）外文

宮川尚志，《六朝史研究（宗教篇）》，京都：平樂寺書店，1964。

## C. 期刊論文

### （一）中文

丁煌，〈唐代道教太清宮制度考〉，收入氏著，《漢唐道教論集》。

丁煌，〈唐高祖太宗對符瑞的運用及其對道教的態度〉，收入氏著，《漢唐道教論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。

文暢平，〈《唐鑑》與范祖禹的史學思想述論〉，《大同高專學報》，第11卷第4期，山西：山西大同大學學報[社會科學版]雜誌編輯部，1997.12。

朱振宏／范祖禹《唐鑑》的編纂特點及其史論探析：以《唐鑑·高祖》為探討核心

王盛恩、黃秋嘯，〈北宋中期的唐史研究述略〉，《平原大學學報》，第 23 卷第 1 期，河南：河南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6.2。

王德毅，〈范祖禹的史學與政論〉，收入氏著，《宋史研究論集（修訂版）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3。

朱振宏，〈范祖禹《唐鑑》的編纂及其內容特點——以《唐鑑·太宗》為探討核心〉，《史學史研究》，2008 年第 4 期，北京：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總第 132 期，2008.12。是文後收錄瞿林東、葛志毅 主編，羅炳良、郝振楠 副主總，《史學批評與史學文化研究》，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2009。

宋馥香，〈論北宋的唐史編纂和政治訴求〉，《史學理論研究》，2006 年第 3 期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，2006.9。

李樹桐，〈李唐太原起義考實〉，收入氏著，《唐史考辨》，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65。

汪高鑫，〈司馬光范祖禹唐史觀點不一致論〉，《安徽史學》，2000 年第 1 期，合肥：安徽省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，2000.3。

孫立堯，〈“史者儒之一端”試解——兼論司馬光、范祖禹的史論〉，《南京大學學報（哲學·人文科學·社會科學）》，第 40 卷第 2 期，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3.6。

孫瑜，〈《唐鑑》及其史學價值〉，《山西大同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第 21 卷第 2 期，山西：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，2007.10。

高葉青、賈二強，〈《唐鑑》成因及其史學地位探析〉，《唐都學刊》，第 23 卷第 4 期，西安：西安師範專科學校，2007.7。

陳勇、韋慶緣，〈《唐鑑》何以見重於宋室——兼論范祖禹的封建正統思想〉，《吉林師範學院學報》，1994 年第 4 期，吉林：吉林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4.12。

陳鏡光，〈范祖禹《唐鑑》之研究〉，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，未刊本碩士論文，2004。

鄔國義，〈《通鑑釋例》三十六例的新發現〉，《史林》，1995 年第 4 期，上海：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，1995.12。



劉靜貞，〈權威的象徵——宋真宗大中祥符時代（1008—1016）探析〉，宋史座談會編，《宋史研究集》，第二十三輯，臺北：國立編譯館，1995。

鄧廣銘，〈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問題辨析〉，收入氏著，《宋史十講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。

## （二）外文

大塚宏昌，〈和刻本「唐鑑」について〉，《漢籍：整理と研究》，第6號，東京：漢籍研究會，1996.12。

氣賀澤保規，〈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的性格特點〉，收入劉俊文主編，《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（六朝隋唐卷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。

朱振宏／范祖禹《唐鑑》的編纂特點及其史論探析－以《唐鑑·高祖》為探討核心